

赵树理文集补遗

董大中 编录

汪毅夫
一九八二年文
陈欣前同志赠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印

1982年4月

前 言

赵树理是在一九四三年写出《小二黑结婚》之后一举成名的，但他的创作生涯开始得很早。如果说写于“自新院”里的几篇还只是练笔，那么，一九三〇年冬天写的长诗《打卦歌》，则可说是他创作生涯的真正开始。此后，他写了很多各种形式的作品。史纪言在《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中说：“约在一九三四年，赵树理同志流浪到太原。他给这个副刊写了很多稿子，有《铁牛的复职》、《盘龙峪》、《有个人》等，内容已记不清了。据赵树理同志谈，前后在太原流浪期间，他写的稿子，约有二、三十万字，内容主要是暴露军阀统治下旧社会的黑暗。”（《汾水》1980年第一期）一九三七年，赵树理参加了革命，在党的宣传部门从事工作，写作更多。“据赵树理同志谈，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这两年中，编过三个小报副刊，写过二、三十万字。”（同上）另外，他还创作和改编过近十个剧本。这许多作品，除了剧本《万象楼》在一九五〇年《工人日报》上连载，上党梆子戏《韩玉娘》在太原和晋东南一些地区演出，有韵小剧《打倒汉奸》和小说《金字》两篇由作家根据记忆重新写出、发表以外，人们大都不知道，而它们却是赵树理成长道路的实录，不接触这些作品，我们所看到的赵树理就不是“全人”，对他所以能成为一代名家，也难以作出深入的和比较准确的解释。

比如赵树理参加革命之前，他的思想是怎样的呢？一些老同志回忆，赵树理在太谷县北洸高小教学是被突然辞退的，而其原因是他的“思想进步”，那么这“思想进步”又表现在哪里呢？这只要读一下《太原零拾》等篇就可以看出来。这篇文章是把矛头直接对着阎锡山而有所挖苦的，文内列举的“敝省”的十一件怪事，就有

好几件发生在阎锡山家，或与“敝省政府”有关。这篇文章是一九三三年冬天写的，正是赵树理在北洸高小教学的时候，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他就被辞退了。当然，赵树理被辞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组织了一个秘密的读书会，而不是写了这篇文章，但这篇文章表现了他当时的思想。

再如赵树理的大众化。有些论者把赵树理描绘成一个天生的大众化的作家，这显然不对。且不说最初写的《悔》和《白马的故事》是完全欧化的。七言长诗《打卦歌》之后有一则“声明”，说他用那种形式写，是为了“试试难易”。这里的“试试难易”，似乎主要指那种形式写起来是“难”是“易”，但也包含了那种形式是否易于为读者所接受的意思。可见他这时仅仅处在试验、探索的阶段。直到一九三四年他才萌生了“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的思想（《回忆历史，认识自己》）。就我国现代文学史来说，五四时期还没有提出文艺“大众化”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二十年代后半期。一九三〇年，即在赵树理写《打卦歌》之前，鲁迅写了《文艺的大众化》，提出“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新版《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49页）一九三二年上海展开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瞿秋白等人发表了许多卓越的见解。一九三四年深入一步，讨论到“大众语”和“拉丁化”问题，鲁迅写了《门外文谈》等好几篇文章作了论述。赵树理说他“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是可信的。从写于这一年的长篇小说《盘龙峪》现存部分章节来看，他的大众化风格这时已初具规模，但还留有明显的欧化残余。因此可以说，尽管赵树理具有实现大众化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尽管他在长治四师读书时就因“学生腔”碰壁而苦恼，然而，他的成长是不可能超越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客观规律的。

总之，要全面认识赵树理，不接触他在成名之前的长时期里的

作品，是不行的。

正是出于这一点，我在研究赵树理的生平和创作中，注意搜求他的旧作。但这样作有两大困难。第一，三十年代太原出版的报刊杂志和抗日战争初期赵树理亲手编的几种报纸格外的少，而他的作品主要是在那些报刊上发表的。第二，赵树理在成名之前发表作品，几乎全用笔名，而且除了“野小”、“王甲土”和“常哉”（即“尚在”）三个笔名以外，都不固定，随用随扔，他自己也不记得，只在临死之前告诉了女儿几个笔名。这样，一方面很难见到他的旧作，另一方面，即使见到了，因为不知道署名，也无法作出判断。

收入这本书里的一些旧作，都是在先知道笔名以后才予以确定的，有些篇还请有关同志作了鉴定。比如《过差》和《忧心的日子》两篇。据赵广建说，她爸爸在临死之前不久见她那次时说，他在《山西党讯》上发表作品用过“白痴”和“孔仰圣”的笔名。有两年多时间，我只知道有这两个笔名而未见到作品。后来找到了两张《山西党讯》，恰好，一张上有署名“孔仰圣”的《忧心的日子》，一张上有署名“白痴”的《过差》。两篇都是连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个片断。即使这样，它们也很珍贵。因为显然它们都属于长篇小说《盘龙峪》，使我们在《盘龙峪》第一章之外，看到了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一鳞一爪。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当另文论述，这里就不说了。

再如“老西”。三十年代前半期和赵树理有过交往的同志都说，赵树理曾在林语堂主办的《论语》和《人间世》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可是笔者没有找到，别的同志也没有找到。为了搞清楚赵树理在北洗高小的教学情况，我拜访了张启仁同志。张启仁回忆说，赵树理在北洗高小教国文时，他也在那里教书，两人对门而居，经常见面，傍晚常坐在一起谈天。又说，赵树理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读给他听，作品发表了，也要拿给他看。赵树理的作品发表在哪里，

题目是什么，他已记不清了，但笔名还记得很清楚，是“老西”。我们知道，过去，人们称阎锡山为“阎老西”，“老西”也是人们对山西人的称呼。我想，既然如此，这个笔名多半用在外地刊物上，在山西发表文章是不会用的。果然一查就找见了，是发表在《论语》上的《太原零拾》。这篇文章会不会是别人所写呢？第一，从题目（也可以说从全篇的内容）和署名看，作者不会是外省人。第二，我查阅了《论语》和《人间世》的全部篇目，除了一二个人以外，不见有当时在山西的其他人的作品。后来跟一些同志说起，老作家西戎说，赵树理曾经说过，他用“老西”的笔名发表过作品。因此，这一篇可以肯定为赵树理所作。

发表在《中国人》周刊上的作品属于另一种情况。早已知道，《中国人》周刊是赵树理和另外几个同志办的，其第四版《大家看》副刊，则为赵树理手自经营，从撰稿到编排、校对，几乎由他一人承担，他自己就说拉不到外稿，所用笔名也很多，常常是在排版中间，顺手从字架上摸出两三个铅字，只要连起来象个人名使用上，以致他把“胡起名”（音）也作为一个笔名。可以肯定为赵树理所作的有十几篇，本书收入两篇。

至于《文化与小伙子》、《变了》、《一群快乐的人们》等，它们所用的笔名都是人们所知道的，文章的内容、风格也非赵树理莫属，本文不再赘述。《农村的谚语》等篇（其中有一篇也刊于《论语》），或因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查实，或因与他人合写（如《给郭沫若的复电》），仿《赵树理文集》之例，我们把它编入附录，供研究者参考，也望知者对其可靠性提出意见，请不要引用。另有十几篇，由于所用笔名无人说过，无法肯定，只好暂时排除在外。

以上说的是赵树理在一九四三年写出《小二黑结婚》之前的旧作。一九八〇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赵树理文集》，收入各种文章近二百篇，除剧本《邮宫图》、《万象楼》和作家解放后

重新写出的《金字》、《打倒汉奸》以外，都作于一九四三年以后。其中有些篇，作家从未编入过集子。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必然还有遗漏。本书中收入了十几篇。另外，赵树理生前发表过许多讲话，现收入一些。还有些文章，已知道线索（包括所用笔名），笔者曾把线索告诉一些赵树理研究者，至今尚未找到。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所收佚文中，《打卦歌》、《来来往往》、《向世界人民呼吁》三篇是北京大学黄修己同志找到的，剧本《韩玉娘》是晋东南地区文化局栗守田同志找到的。《向世界人民呼吁》一篇系用俄文在苏联《真理报》发表，黄修己同志找到后，特地请阮积灿同志译成中文。在辑录赵树理佚文过程中，笔者得到老作家西戎、康濯等同志以及北京鲁迅博物馆陈漱渝、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王峻峰、《浙江日报》社傅斌等同志的帮助。封面设计为田汉清所作。一并在此致谢。

本书如有错误和不周之处，敬希指正。

1982年3月

目 次

第 一 辑

(1930—1937)

打卦歌.....	(1)
给一个学生的题词.....	(5)
太原零拾.....	(6)
盘龙峪 (第一章)	(12)
忧心的日子 (片断)	(25)
过差 (片断)	(27)
文化与小伙子.....	(29)
“雅”的末运.....	(31)

第 二 辑

(1937—1949)

题一幅画.....	(34)
韩玉娘.....	(35)
一群快乐的人们.....	(60)
怎样利用鼓词.....	(62)
变了.....	(63)

神枪手刘二堂·····	(67)
一把锁·····	(68)
闹元宵·····	(69)
来来往往·····	(71)
《孟祥英翻身》小序·····	(76)
汉奸阎锡山·····	(77)
一幅戏台对联·····	(80)

第 三 辑

(1949—1965)

工人文艺问题·····	(81)
斯大林与文学·····	(83)
在戏剧改革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84)
在诗歌朗诵座谈会上的发言·····	(86)
向世界人民呼吁·····	(88)
在抗美援朝文艺作品座谈会上的发言·····	(90)
本书的产生及其特点	
——《工人文艺创作选集》第一集代序·····	(92)
在《三千里江山》讨论会上的发言·····	(94)
业余创作漫谈·····	(96)
在深入生活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101)
给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	
编者的信·····	(103)
文艺与生活·····	(104)
在北京市业余作者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107)
生活·主题·人物·语言·····	(111)

在中华函授学校“讲座”第四学期开学式上的讲话…… (121)

石头歌(残句)…… (125)

附 录

农村的谚语…… (127)

义务勘误…… (140)

南洋华侨女飞行家王秀云女士小记…… (143)

给郭沫若的复电…… (144)

打 卦 歌 *

铃铃金钱旋案落，
憔悴游人来问卜，
一掷再掷已六番，
卜士敬问座上客：
“阁下此来欲何占？
将为求财抑高迁？”

占者闻言称“否否”，
重整仪容微摇首，
进谓“原籍河南人
少年嗜剑走江宁，
歌风啸月乐无羁，
豪友江干时送迎。

“归去躬逢直皖战，
划将田舍作防线；
冲击声中起哀号，
硝烟阵里墟庭院，
夜半檐前舞流弹，
阶次‘砰砰’落瓦片，

* 原载1931年1月14日《北平晨报》第五版《北辰艺圃》，署名“野小”。

龙泉不敌弹纵横，
空使英雄恨懋懋，
俄尔窗前大炮作，
一声霹雳半屋仆，
可怜家父葬颓垣，
背母惊驰幸得脱。

“闻道山西方太平，
携囊扶母逾太行，……
——卜士倦坐苦言频，
搁笔横肱待其陈。
占者座上略欠伸——
携囊扶母逾太行，
石峦越尽凝眸处，
信步卜居入上党。
囊空无物苦饥寒，
依依母子泪阑干，
少年挥剑千钧臂，
方今提得乞儿篮。

“回忆当年诸父老，
授我家传千灵膏，
采药西登王屋巅，
归炼灵膏向市廛，
技击招将顾主至，
自是方得市米钱。
浪迹奔驰六七年，
节将余资寄母还，

时亦频频奉母示，
屡云‘居处称平安’。

“迩来溃兵潜晋南，
狂涛击破武陵源，
泽州一带匪扰遍，
一日报端三五见，
仓皇迭访南来人，
询叩十人九称‘乱！
村庄男妇走相逃，
枪声震处裂人胆，
鸡鸣藩篱屋宇空，
尘封旅道行人断。’

“闻斯怵怵起归思，
叵奈商情非昔时，
日营晋钞五六角，
糊口之外无余资，
千里川粮一无凭，
愁肠牵断不成行，
遥念阿母年七十，
如何耐得军火惊？！
虔祈先生启愚昧，
神占阿母安也未？”

卜士抚首语呻吟：
“谨请阁下毕其听：
‘父母’临‘应’作‘用神’，

复以日辰来相生；
更值冬令‘午火’空，
虽有‘官鬼’不主凶，
‘丑土’化‘辰’是‘进神’：
太老夫人得安宁！”

占者致资稽首去，
蹒跚步下暂是慰。
阔大战场九万里，
同胞南北东西徙，
世外桃园觅无津，
妻失夫兮母弃子，
安得卜士千万位，
招来组作卜士队，
遍行各地慰流人，
胜他多少十字会。

（附：这段故事，我所以要拿旧体格来写，不过是想试试周易，并没有缩回中世纪去的野心：特此声明。）

一九三〇、十二、二十七夜。

给一个学生的题词*

九曲风清何处险？
人道有篇，
我道无篇。
我较你长几年，
人世甘苦，我已尝遍。
唯学校是真正的乐园，
胜似西方极乐天。
在这里不管它春风怒吼，
……（中缺）
只要每日应着铃声转，
哪怕它群魔翻劫古佛殿，
祝尔青年，
不逢太平世，
切莫向人间。

* 大约在一九三三年初夏。

太 原 零 拾*

话说敝山西省自从十九年倒×失败，扩会塌台以来，在新闻纸上竟连一点重要性也没有了！在我观之：这只能算一般新闻记者的薄幸成性，显现出世态炎凉的常态来；若有人因为报纸上不大见到敝省之名，而便真个以为敝省是没有什么，那他算上当不浅！今且将太原的新近小事说个三五件，以见敝省并不怎样无足轻重的一斑。

(一) 不重生男重生女

有马君志远者，曾追随梁漱溟（并非我的朋友）有年，敝绥靖主任之同乡，五台人也。近在该县教育会办一小报，鼓吹村制。日前载新闻一则，标题《不重生男重生女》，文甚有趣，录之如次：

“古历七月二十二财神爷圣诞之日，本县大建安村徐老太太夫人出引安葬；其女竹青儿为之作种种纸扎冥器，千般百样，千奇百怪，约值洋五百馀元。现值经济紧迫，农民谋生不暇之秋，该女能发此宏愿，超度其母，诚山西罕见之孝女也！竹青儿何人？即少儿缺女之徐友梅女士；亦即‘勋一位，一等嘉禾章，一等文虎章，山西大都督，同武将军，军事善后督办兼省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海空军副司令，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晋绥绥靖主任百川阎公锡山，小名万喜先生之结发元配夫人也’。生女如此，徐老太太夫人有灵，可以含笑于九泉矣。伊男东喜，七瘸八拐，何足重哉？故曰‘不重生男重生女！’”

* 原载《论语》第29、30期，署名“老西”。

(二) 唯中论

敝主任因鉴于唯心唯物之派别纷歧，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之莫衷一是；于是发明一新哲学曰“唯中论”，并演绎成“唯中史观”。前曾由主任手著解说之书多种，流布敝省各地；唯卒因军政少暇，未能详事推阐。近乃由一北大毕业之李君号冠洋者，代为负发扬光大之责；而且还由主任拿出子儿，特为李君办一《中报》，以资流传而便发表（发表李君之著作也）。计阎李两君前后著作成书者，已有七八种之多，特哲理太深，一般人未易领会耳。

(三) 学而时习“三”

朱君哲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而太原各大学之名教授也。近著《儒学新解》、《大中解诂等书》，颇见高深。其最大收获，厥为发现古书中“之”字多为“三”字之误！今略介绍其说，以饗国人：

“大学之道，‘之’当为‘三’。理由甚多，撮要如下：（1）即如此句之下，紧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项，可见‘之’必为‘三’。（2）《易》之三画为‘乾’；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又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三’；而曾子之名，又适是‘参’；可见‘之’确是‘三’之讹。（3）《大学》为内圣外王之书，王者，一贯三也；曾子为孔门独得心传之人，而曾子者，名‘参’也；可见‘三’为孔门一贯之道，而《大学》开端必须先提‘三’字也。（4）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三’者欤？可是孔子亦只识‘三’，而《大学》当首言‘三道’。（5）《大学》为入德之门，故曰‘在’，在者，从才土，才为木初生条，得土为养，故曰入德之门也！可见《大学》之道，正是‘三在’之道，今讹为‘之’失《大学》之道矣！（6）下连用三‘在’字，便是列举而指实其数之意；否则，一‘在’字已足，何必三也？（7）‘之’当为‘三’，古书中其例甚多：《论语》，足食，足兵，民